

# 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与新社会运动

——一种社会资本视角的宏观分析

姚 伟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raised by the neo-liberalist economic model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1990's. In terms of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e theories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he paper explores in macro level the reason, new features and the doom of the movement. At las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pay great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the modern social capital.

—

在西方发达国家,直到二战前,古典、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在经济学中占主流。相应地,这些国家实行的也是以自由化、私有制和政府不干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是伴随这种经济模式的,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工具理性的昌盛;一方面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和宏观经济失衡,以及人文因素被简约和消解,个人被极端原子化和单面化(贝尔,1989:12—15)。这又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大灾难。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和新福利经济学成了经济学中的主流。前者批驳了市场会自动调节供给与需求的观点,指出市场可能失效,主张政府必须用财政和金融政策对经济生产进行宏观干预(朱国宏主编,1999:290—291);而后者则更进一步,主张政府要在经济分配上发挥重要调节作用,主张建立公私混合制企业(陈红霞编著,2002:261)。相应地,在50、60年代,发达国家竞相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和凯恩斯主义。在这种经济理论与模式中,政府被视为具有完全理性,成为积极的经济行动者,而企业和个人成为消极被动的经济行动者。其结果是,财政巨额赤字、企业经济效率下降和严重的个人依赖性。这又最终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经济滞胀。于是,承袭了古典、新古典经济理论实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又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和新福利经济学,成为当今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相应地,西方发达国家也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来回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学不断在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微观与宏观、政府与市场、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等对立两极之间来回摇摆;个人、市场、企业、政府的经济性质、功能与局限得到充分显现。

现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是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具体包括:政府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管理,自由市场与私人企业在经济运行中重新发挥主体作用;政府大幅度削减对公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各种生活补贴和公共福利,公民个体重新成为经济行为的积极主体;重农主义重放光芒,生产、资本、金融、贸易全球化等。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似又重新回到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不同的是,由于不断创新的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支持,生产诸要素出现了新的组合,个人、市场、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新的调整,经济效益得到了提高,发达国家在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中实现了新一轮持续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革新。加上发达国家原本生产力已经相对发达、民众经济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又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转嫁国内矛盾等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与理论在发达国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以本国公众为主体的抵制运动,它的主流地位也因此得到巩固。

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模式也正在成为全球性的主流经济理论与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

来,随着苏东解体,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民主政治理论一起,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些国家迅速流行。与此同时,很多走“混合型”、“第三条道路”的欠发达国家,虽然一度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了较大的经济发展,但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及发展战略的缺陷,也逐渐陷于停顿和困境。英美等国趁机向这些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使欠发达国家掀起了经济模式转换高潮。就这样,几乎所有国家都被纳入了以英美诸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呈现出全球化趋势。

尽管各发达国家的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都是认可和参与的。比较起来,欠发达国家(包括前苏东国家)民众对它的态度则复杂得多。在多数欠发达国家,这种模式并没有带来预期效果,却严重地损害了普通民众利益,在各国内部普遍引发了抵制性社会运动。下文主要以拉美国家为例,进行一些简要分析。

## 二

拉美诸国较早进行了独立革命,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前普遍实行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大力发展民族国有工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墨西哥、巴西等国的经济发展还被称为“奇迹”。但由于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城市化畸形发展、对外贷款被非生产性地使用、产权模糊的民族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出口竞争力弱小等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失衡严重,80年代最终爆发了以国外债务危机为诱因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美苏对抗时期,美英等国出于自身目的对拉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援助。但冷战后,它们开始挟债权向拉美国家施压,促其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转变,以期从中得利。面对国内困境与国外压力,拉美诸国政府于1990年代初起,被迫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转变。其主要措施包括,经济自由市场化,对内取消物价控制,对外消除投资壁垒,国际贸易自由化,降低本币对外币的汇率;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行政事业部门与未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大裁员、降低工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开支大幅削减等。拉美民众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经济模式的急剧变革。从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相对于进口替代时期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拉美诸国的实践结果却与发达国家大相径庭,国民经济没有获得多大的发展,一般民众没有获益,相反却导致失业加剧、生活费用上涨、债务无形剧增、贫困加深以及社会失序。拉美各国民众因此发起了广泛的抵制性社会运动。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一些拉美民众采取了“退出”这种消极抵制形式,即退出原来赖以谋生的地区、产业、部门而进入到新的地区、产业和部门,主要包括从城市退出而进入农村,从本国退出而移民海外,从合法经济领域退出而进入非法经济领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面前,一些人退出城市回到农村,试图利用在城市中获得的些许资本、技术、经验谋求生路。一些人(也包括少数农民)移居国外,美国是主要目的地。但由于合法移民条件苛刻,他们大多采取非法移民的方式,在移入国从事最低级的非正式工作,受到非法用工者的沉重盘剥。还有一些人则被迫从事非法毒品经济活动,哥伦比亚、波利维亚等国的毒品经济规模因此大增,但受到政府残酷的军事打击。从总体上看,“退出”作为消极抵制,风险高、代价大,仅是少数人的选择。

大多数拉美民众则直接加入到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各种社会运动中。一是以小农生产者为主体的对贸易自由化的抵制运动。20世纪90年代,拉美各国政府把扶持重点转移到出口企业与出口产品生产上,取消保护性关税,开放外资直接投资。这个政策有利于出口导向的大农场的发展及其与外资的联姻,而众多小农业生产者在与国内外大规模综合型农场的严峻竞争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则纷纷破产,于是小农业生产者、农业工人甚至农村中产阶级开始对贸易、外国投资自由化及出口导向政策进行抵制。典型的例子是墨西哥著名的“萨帕塔运动”,该运动运用游行示威、议会选举、因特网信息战等策略,反对本国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反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要求保护土地所有权,反对取消农产品价格补贴等,迫使政府暂停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大对农业公共设施的建设。此外,在秘鲁、巴

西等国的农村,也普遍发生了民众对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抵制运动。二是以城市小业主与小商人为主的对债务增长等的抵制运动。拉美各国政府的降低货币汇率政策,极大地伤害了依靠外国银行贷款的城市小企业主与小商人这些债务人的利益,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偿债成本。他们联合起来,抗议债务的增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墨西哥的 El Barzón(债务者权利组织)运动,反对债权人没收债务人的财产,促使政府和银行实施债务削减计划。在巴西发生的债务者权利运动,要求债权人调整讨债计划,免除部分债务。三是以公共国有部门中下层就业者为主体的反对裁员和拖欠工资等的罢工运动。在90年代,拉美各国政府对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在未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和公共行政事业部门进行大幅度裁员和削减工资,并限制工会活动。公共国有部门工人为此发起罢工运动,反对私有化、裁员和降低工资。阿根廷阿方辛政府、德拉鲁阿两届政府因此下台。不过从总体上看,这种罢工运动规模较小,力量削弱得也很快。四是以城市中下层民众和学生为主体的对消费费用增加的抵制运动。90年代拉美各国政府大幅削减甚至取消城市民众的食物、燃料等的价格补贴,提高公共服务收费,住房实行商品化,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度,使城市民众的消费费用成倍增加。因此,巴西、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波利维亚、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各国普遍发生消费者运动和学生罢课运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市还发生了贫民窟居民的“无片瓦人运动”,要求改善居住条件。五是中下层反社会失序的示威游行。随着新的经济模式的实行,拉美各国社会中的违法犯罪现象日益猖獗,很多政府官员、机构职能异化,丧失了责任感和正义感,变得各顾自利(Bourdieu, 1998),行政官僚腐败严重;很多司法官员、机构也加入了腐败行列,成为违法犯罪的制造者而不是解决者,违法犯罪因此得不到惩办,犯罪文化逐渐形成,产生出更多的犯罪。拉美各国的经济、法律与社会秩序由此陷入混乱。受害最深的是处于弱势的中、下层普通民众,因此他们不断游行示威,要求恢复基本秩序。如1999年里约热内卢暴发生了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要求清理警察腐败;2000年墨西哥城发生了中产阶级民众的示威游行,反对急剧上升的暴力犯罪和官员腐败。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使拉美各国陷入了社会运动的狂风暴雨之中。

与以往社会运动相比,拉美民众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社会运动,表现出如下几个新的特征。一是经历了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之后的拉美民众,在运动中大多不再以传统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而宗教、传统文化思想、种族主义、环保主义、地方主义等多元化的思想则在运动中发挥着指导作用。二是不同的运动在内容要求上各不相同,有的甚至毫无关联。如消费者运动是要求降低费用支出,工人罢工是反对裁员与降低工资,债务人权利运动是要保护债务人权利等等。三是每一运动都以不同的特定阶层为主体,参与则是多阶层的。四是运动的非正式组织性。运动不是靠政治化程序、经济性奖惩、强制性规范来实现的,主要是通过共享网络上的相关信息、共同的身份认同——如共同的亲缘关系、属同一种族性别,以及同一社区氛围等——来相互影响实现的。

此外,近年来,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全球化的国际性社会运动也日益高涨。这些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比,在指导意识、组织方式、斗争手段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吴易风, 2003)。

### 三

为什么同样的经济模式,在拉美诸国会带来与在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它在拉美诸国会引起广泛的抵制性社会运动?为什么这些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相比,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笔者认为,客观上有着多重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学术界的解释也千差万别,但大多仅限于某一学科之内,因此解释可能是“片面的深刻”。

当前,学术界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我们解释以上问题,可以提供新的思路。社会资本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洛瑞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钟涨宝等, 2001),后由布迪厄将之引入社会学,由普特兰将之引入政治学,社会资本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虽然社会资本理论总共才有二十来年的历史,其本

身还多少显得有些零散,但是,由于社会资本理论适应了方法论创新,超越了个人主义、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局限,强调个体的主体作用,但又不是个人主义,实际上与后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等相通,这就为我们分析个人、企业、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限制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并且,它通过公民社会理论、经济“嵌入”社会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一些学者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新社会运动进行了微观层面的解释,如,苏珊·艾斯特因(Susan Echstein)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了移民过程、抵制运动的具体组织过程等,使我们对新社会运动本身有了深刻认识(Guillin et al., 2002: 331—356),但这种微观研究重在实证研究,研究过程中较少“价值关联”,而且其所谓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社会资本,而是一种传统的、差序有别的甚至是落后的社会关系。因此,本文拟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视现代公民社会为现代社会资本载体,视社会网络为现代社会资本运行的途径,以现代社会资本为核心视角,对新社会运动的原因、特征和前景进行宏观的解释。

首先,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欠发达国家引起抵制性社会运动的原因。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看,除了上文所列之外,此经济模式之所以在发达国家未受到大的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在发达国家,西方现代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和社会网络已经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积累了较多的现代社会资本。这使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较好地“嵌入”了文化危机缓解后的社会文化结构中,特别是使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多数民众个体,能利用较发达的现代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和社会网络,即利用其较丰富的现代社会资本,在经济上实现“自我救助”、“自我保障”,从而有效地降低了种种经济行动如求职中的成本,而政治上的有效监督限制了政府系统的活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较好的基本秩序。所有这些,使随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而来的失业、贫富分化、政府腐败、社会失序等问题得到了较好的预防、补救和解决。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就很少发生以西方本国民众为参与主体的抵制性社会运动。

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能使一些欠发达国家更快地从集权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发挥本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充分利用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民众收入。但是这一看法太过“玫瑰色”了。一些欠发达国家,在实行新的经济模式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牺牲民众利益和进行制度变革来提高效率,缺少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因此,几乎每一项调整政策,都会特别地损害某些阶层的利益,从而引起以这些阶层为主体的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尽管主张资源全球性市场化配置,但在实践中,发达国家只许它们的优势资源资金、技术等自由流动而严格限制欠发达国家的优势资源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参见杨帆),并严守核心技术机密和垄断金融资本。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且,为了能顺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发达国家还对欠发达国家的劳工团体、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进行系统改造、破坏和解构(Bourdieu, 1998),并培植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因此,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欠发达国家必然受到民众的反对和抵制,抵制的矛盾也就指向了政府。

同时,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也是很多欠发达国家发生抵制性社会运动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身并未超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不是一种既发挥政府、市场之长又能避之所短、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大众社会福利的制度模式。因此,必须要有其他制度作为补充。而在很多欠发达国家,现代公民社会、社会网络是发育不全的,只能存在于发达的公民社会和社会网络之中的现代社会资本也是缺失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负面影响因此得不到有效限制。结果是,在经济上,普通民众难以从依靠政府转向自我救助、自我保障,因而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必然下降;在政治上,没有公民社会,不能共享政治系统中的有关信息,因而腐败必然盛行;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普遍信任、开放的社会网络和共享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必然失序。可见,缺少现代社会资本,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一些拉美国家引起广泛的抵制性社会运动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关于社会运动为何会表现出新的特征的原因。由于新的社会运动可能开创一种新的社会时代,因此,对于新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必然受到其实践发展阶段的限制。本文对此试作如下的初

步分析。

随着人口的增加,环境问题加剧,而西方发达国家借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全球化向欠发达国家转移经济外部性,加重了欠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并且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处处显示出西方文化中心论和种族优越感。所有这些,都使新社会运动与环保主义、种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产生了某种联系。

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对于克服旧的政府主导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模式等生产率低下,政府失灵和个人、企业经济行为消极被动的弊病是必要的,因此,新的社会运动也不再以上述经济模式为方向,也不再以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这是当然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的激烈竞争与各国政府的空前合作面前,在高科技革命与知识信息社会来临的大趋势下,过渡的抵制不仅对自己风险太大,对民族的风险也太大,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停滞,与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开距离。因此新社会运动大多致力于民意表达,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

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现代公民社会、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缺失,使这种意见表达性的社会运动只能依靠传统的、种族的、地方性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宗教组织等来维持,因而表现出非统一性、非正式性和地方性。

第三,运动的前景。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根本的问题在于,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找到第三种制度,使政府与市场在发挥其长处时,又能真正弥补其失效之处。其答案就是现代社会资本。这种作为制度的社会资本,能填补政府与市场的功能空白,克服政府的“知识谵妄”和完全理性假设;能确保人们借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实现经济发展和共同福利增加。其发生作用的机制是,以现代公民社会为载体,以现代社会网络为途径,以共享信息、普遍信任、公共道德规范为条件,把个人、企业、政府与市场联结在一起,进行物质、知识、权力、声望等资源的交换,在政府、市场、企业、个人的互动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有机统一。可见,一些理论研究者把现代社会资本视为继市场、政府之后的第三种社会“元制度”(曹荣湘,2003:1—13)是不无道理的。

可以看到,如果能在欠发展中国家形成一种现代社会资本,从而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以公民社会为载体,以现代社会网络为途径,以共享信息、普遍信任、公共道德规范为前提,使自己在政府、市场、企业的互利互动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有机统一,那么,针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运动就会走向良性轨道,否则,就将如一些人所攻击的,成为“理想主义者、无赖、闹事者”的消极行为,甚至会使社会重回旧模式,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茅于軾,1999:6)。

## 四

欠发达国家加强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首先,又恰恰是这种新社会运动,能够促进现代社会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何增科主编,2000:145)。也就是说,这种运动能承载、传播和改造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生发出新的社会规范、道德和文化精神;能为人们提供对话等“交往行动”(刘少杰,2002:321)的机会,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力量的增强;能在民众与政府、企业之间建立起重要的联系,促进现代社会网络的发展和信息的沟通。但这是一个包含着民众经受痛苦和牺牲的,自发的长期的实践过程。

其次,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自觉地培育现代社会资本。政府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途径主要有:通过教育体系,使公众、官员建立起普遍社会信任观念、道德规范和职业精神;通过明晰产权等制度建设,间接地促进个人、企业着眼于长远,创恒产、立恒心,增强普遍信任,减少一切形式的投机行动,从而建立起经济生活基本秩序;通过政府本身的职能转换,为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提供必要的生存空间,并积极促进它们的发展,奠定现代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基础等等。同时,政府也必须在现代化社会资本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主导作用,因为作为民众利益必要代表而存在的政府,在新社会运动的压力下,不如此就会失去其合法性。当然,政府行动与民众社会运动,制度改革与道德建设等诸因素之间又是一个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过程,关键是要使它们进入良性互动之中。

第三,欠发达国家还可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与西方民众的交往中,通过学习、感受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的帮助,促进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福山,2003)。但是,必须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传统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研究等所包含的西方中心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泥沼。注意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资本的具体适用,处理好社会资本的一元性和多元性问题。同时,还要防止新现代化理论过度肯定传统文化的缺陷。加强现代社会资本建设,并非要恢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如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和内外有别的熟人关系、礼教宗法等,而应在内容上重在转化传统社会资本,在形式上应形成普遍性、弱关系、开放性的特征。这也是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理论者的本意之所在。

总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负面影响,现代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限制、弥补作用,并能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同步。加强现代社会资本的培育,是大多欠发达国家政府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也是新社会运动的命运所系、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丹尼尔·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

朱国宏主编,1999《经济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红霞编著,2002《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吴易风,2003《反全球化运动考察与分析》,《当代思潮》第3期。

钟涨宝等,2001,《社会资本理论述评》,《社会》第10期。

杨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基本立场与利益》, <http://business.sohu.com/88/71/article202387188.shtml>

曹荣湘,2003《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一种元制度分析》,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茅于軾,1999《丛书序言》,哈罗德·德姆塞茨著,《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何增科主编,2000《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少杰,2002《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弗朗西斯·福山,2003《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曹义焯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期。

Bourdieu, Pierre 1998, Translated by Shapiro, Jeremy J., "The Essence of Neoliberalism: Utopia of endless exploitation." *Le Monde Diplomatique*.

Guillm, M. F., Collins, R., England Paula & Meyer, M. L. (eds.) 2002,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New York: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作者系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沈杰